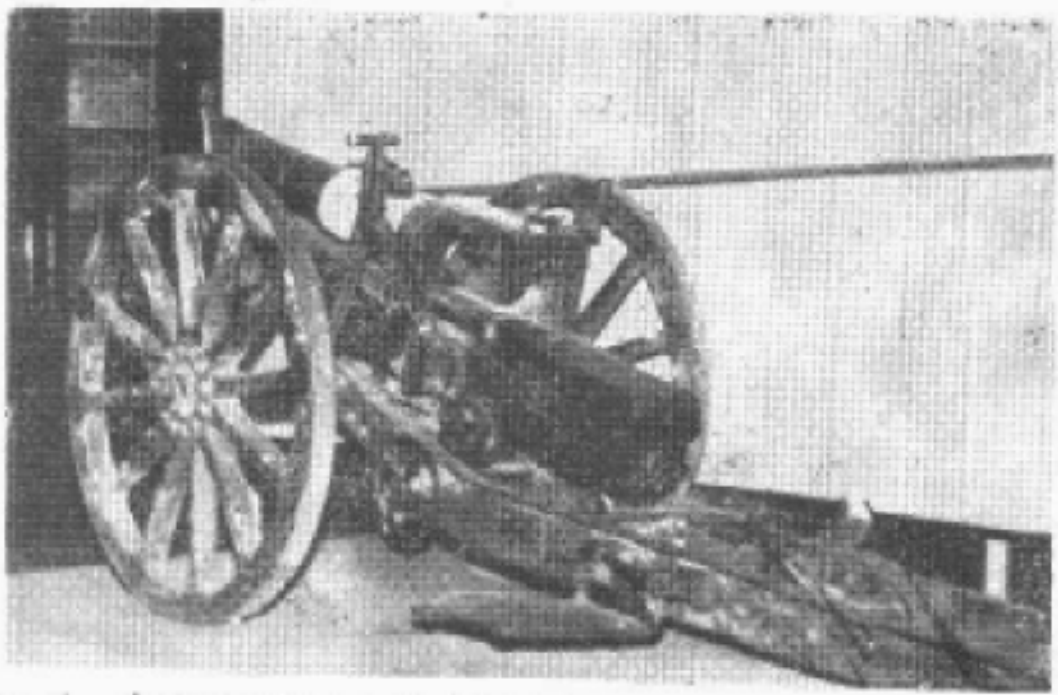
K1182/126





（赵彦幸摄）



左上图　辛亥首义时南湖新军通过起义门进入城内参加战斗

右上图　黄兴铜像原树立在武昌蛇山头，1955年建设长江大桥时暂迁武昌首义公园，1985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市文物管理处正式迁移至汉阳龟山。

下图　辛亥首义时参加战斗的铜炮，现仍陈列在辛亥革命纪念馆。

封面说明： 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会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青山有幸埋忠骨





下图　贺胜桥北伐阵亡将士陵园，建于1929年10月
（严越琦摄）

辛亥百义烈士墓1956年11月15日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3月又全部重修，由98岁辛亥老人喻育之撰写碑文。碑文为：辛亥(1911)年，武昌首义胜利后，满清王朝派遣强大精锐之部南下，起义军民同仇敌忾，以三万未经训练之众，在汉口、汉阳英勇抗击，官佐身先士卒，士兵浴血奋战，工、农、士、商手执利器，亦皆死沙场。从十月十八日起，鏖战四十天，为南方各省大举，次第响应缔结共和赢得了时间。阳夏战争牺牲起义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无名烈士数以千计，时由红十字会就地掩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烈士遗骸集中安葬于汉口球场街，利济北路、汉阳扁担山等地，陵墓几经修葺。呜呼，河山悲气，星芒失色，英勇忠壮，光辉日月，今树丰碑，永志忠烈。

目　录

见到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 ……傅希雯（1）

杨沧白追述中山治学精神 ……王云凡（4）

孙中山最后一次参加“双十节”……谢平难（6）

詹大悲论辛亥武昌首义……杨玉清（8）

记湖北军政府的成立 ……李白员（11）

武昌首义的亲历亲见亲闻 ……王保民（18）

陆军测绘学堂参加辛亥起义经过 ……喻育之（26）

王汉刺铁良之前前后后……何小龙（32）

武昌首义发难人——熊秉坤……熊　辉（36）

辛亥革命党人梁钟汉轶事……梁绍栋（45）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新闻报刊……杨　辉（54）

民国初年的汉口《民国日报》……杨端六（62）

辛亥革命时的社会一瞥……樊锦进（66）

东征北伐亲历记……何元恺（68）
在北伐进军途中……苏文钦（83）
黄埔健儿奋战武昌南昌城下……裘中岳（88）
北伐军攻克武汉大事记
……李文熹　田子渝　陈芳国（97）
在武昌围城内外……谢珈航（110）
武汉国民政府辖区的演变
……毛　磊　刘继增　袁继成（122）
大革命前的武汉学生运动……慎　之（137）

陈继承谈西安事变……陈　越（149）
何成濬何以拒绝邀请不去西安……刘鸣皋（153）
西安事变前后的阎锡山……周　玮（161）
李济深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李任夫（165）
西安事变见闻……苏时仲（169）

复杂多面的黄陂茶馆……喻保明（179）
兴衰继绝的武汉面馆业……袁复心（183）
诗文摘登(补白)……甘绩熙、王保民、张剑平等



傅老近影

见到中山先生的片断回忆

·傅希炎·

清宣统年间，朝廷日趋腐败，文官爱钱，武将怕死，民不聊生，湖北新军工程营一声枪响，武昌首义振撼中原，传遍全国，满清王朝终被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宣告结束，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的翌年（1912年），阳夏激战的创伤未愈，炮火硝烟的余味未散，应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之请，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先生乘船由上海来武汉，到鄂巡视，凭吊战迹，抚慰流亡。

四月十日，雨后天晴，春光明媚，黎都督与中山先生同坐一乘马车来到都督府，站立在阅马厂上迎候的有都督府所属各司、镇文武官员和武汉名流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吴兆麟、熊秉坤、黎本唐、蔡济民、李四光、夏寿康、胡石庵、刘心源、汪悃等一百三十多人。

当年四十五岁的中山先生，身着铁灰色的西装，精力充沛，红光满面，脚步矫健，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接着发表了催人奋进的演讲。先生曰："辛亥首义，光复武汉，全国响应，阳夏激战，历尽艰苦，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种族平等业已达到。"并奉告在场军政人员："现在革命初成，尚望大家协力同心，勉力从公，做出成绩。"他在谈到辞去临时大总统问题时说："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流离海外，得到同志们的推许，既感且愧！有些人以为我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我之所以辞职，实想和同志们在社会建设中同找一个统一改进的办法。”听者无不为之感奋，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黎元洪讲话时对先生奔走革命，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之功，极为推崇；对先生功高不居，解职下野，深表敬仰。

演讲毕，中山先生又单独与黎都督晤谈。我时年二十四岁，正充任黎都督的卫队营营长，有幸受到中山先生接见。黎都督与中山先生寒暄之后，便将我介绍与先生。都督说：“这个小青年虽年轻，但很能干，帮助我办了很多事。他作战也很勇敢，在阳夏激战中还负过伤。”中山先生当即表示赞赏，勉励我好好干，同我亲切握手，并拿两个小桔子给我吃。先生还问了我在武昌首义中的举事经过，“带有多少起义队伍？队伍听不听指挥？”我便简略地向先生报告了辛亥首义的情况，并告诉他：“我当时在测绘学堂学兵班当术科班长，平日教学生们剑术、马术、体操等，当时我带有新旧两个班，共百人。我熟悉他们，他们也听我的指挥。”先生听后连声称“好，好！以后我们一起尽瘁社会革命事业，务必达到三民主义的目的而后已。”并对黎都督说：“这个小青年很不错。”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满腔热血沸腾，只感到一股股暖流全身流遍，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并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实现三民主义建功立业，以报中山先生的厚爱。

是日下午，中山先生及其随员视察参观辎重营、纱布局和游览黄鹤楼，我被派随行护卫。先生一行出平湖门由汉阳门进城，这时在城头上、江岸边挤满了人群，他们要亲睹先生的风采，聆听先生的教诲。先生向在场的群众问好、致意。他说：“今日有幸与诸位畅游欢叙，交友谈心，是我平生的一大欣慰！”

接着说：“我们既已凭藉进步的国民思想创立民国，更要以最大的热心、最大的毅力，把中华民国建设成为先进的民国。”他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应当有主人翁思想，享国民权利，尽

国民义务。”

回到都督府，黎都督设宴款待中山先生一行，我被叫去当侍从，招呼宴会警戒。宴会结束，黎都督陪先生一行去黄土坡下阅。我又跟随护送。晚上，我还做了红烧甲鱼、清蒸鲫鱼给先生宵夜。

翌日清晨，先生一行继续去巡视，我因另有公务，便告别于先生，哪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尔后我曾去找过中山先生，因他日理万机，昼夜繁忙，始终未能如愿。

日月流逝，我与中山先生永别已七十有四年了，然而先生的亲切教诲至今还记忆犹新，先生的音容笑貌也常浮现眼前。在纪念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回忆见到先生的幸福情景，重温先生的谆谆教导，缅怀先生的革命业绩，更激起我对先生的无限怀念和追思。喜看今日之中国，先生的三民主义夙愿早已在祖国大陆变成了现实。神州处处春常在，我这个辛亥老人，欣逢盛世，安度晚年，深感莫大幸福，明年我做百岁大寿时，将向先生的在天之灵敬上一盅慰灵酒，聊表我这个老卫士的赤诚之心，让先生的英灵含笑于九泉。

（赵功清记录整理并摄影）

傅希奕，辛亥老人，现年九十九岁，武汉市文史馆馆员。

杨沧白追述中山治学精神

王云凡

在抗日战争以前，上海福煦路104号有一所老式的红砖洋房，居住人是四川籍的杨沧白（又名庶堪）先生。房子不临街，前面有草、树，左侧厢有个方方正正的花园，环境很幽静，据说孙中山先生曾经在这里住过。

1936年我在上海，经常去杨老师家里，看见那会客室、书房墙壁上，悬挂着好些孙中山先生的亲笔题字和他送与杨老师的各种半身、全身照片以及好些十四寸以上的纪念团体照。最使我注目的是一幅大元帅府成立的纪念照片，它的上面还有孙中山先生的亲笔签字（题了上款），上面还有很多参加大会的人。

有一次，我谈起中山先生的签名，在书法上是那样雄浑有力，一丝不苟，每个签名都是一样，好象刻就的印章，仔细看来，却又是毛笔写的真迹，墨色生辉，只是相片有大小，签字也随之有伸缩。我好奇地问杨先生："中山先生的书法，成了一种特殊风格，使人一望而知是他的亲笔，堂堂正正的，笔短而方，是不是出于北碑？"杨老师是同盟会老人，他们对于孙中山一直是称作"先生"，其敬仰态度，最是诚恳，听了我提出的问题以后，杨老师就告诉我一段中山先生的轶事，使我很受感动。他说："先生平日，于书无所不窥，经常手不释卷，聚精会神，所到之处，中西书籍，罗列满前，又喜与人讨论，滔滔莽莽，口如悬河，每一例出，总要使听众完全明悉。其海人不倦的精神，

正如他平素治学一样，十分令人敬仰。先生还有一种谦逊的神，犹为不可及，你提到先生的书法问题，你不晓得先生对于他自己的书法，态度上更为谦逊。先生暇时常同我谈起他早年从事革命，奔走海外，虽然对于书籍，理论上不时作研讨，但对于书法简直没有用过一天功。因此，当时引以为歉。

“先生有一个习惯，每天要午眠，这是大家共知的。虽然时间短暂，但在午眠的时候，有再重要的事也没有谁去打扰他。在广州时，我担任大元帅府的秘书长，先生有时接见外宾，也爱要我坐陪。（在辛亥革命前，杨老师系中学堂的英文教员，英语流利）有一次，为了当时交涉上的一件要事，我去先生那里较早，叩门进屋后，见先生正在书案上写字，临帖的架子上，赫然摆上了一本钟繇的宣示表。我当时惊喜得很，忙注意看先生的临本，先生笑着说：‘不成样子’，‘我还没有学好。’于是急忙把纸叠起来，放在书架下面了。原来先生在利用午眠的时间，闭门临写钟繇法帖。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所以，先生的书法是那样工整，其用笔大有分隶的意味，原是出于钟繇，你看先生的签名，以及他的著作手稿，或者写的便条，下的命令，书法上都是那样的端庄谨严，其不可及处，真使人崇敬。你问先生书法是不是出于北碑？大概是以为受了广东派康有为的影响。康正是承包慎伯之后，极力标榜北碑的。先生写的钟繇体，则是在书法上未分南北以前。南方当然是以王羲之为首，学的是钟繇体，而北碑流派，亦大多数学钟繇体，实则先生并未临写北碑。”

杨老师说得很高兴，又上楼去清理他的书箱，捧出了很多中山先生写给他的信件，一一地递与我看。那正是“七·七”事变前春间，听了中山先生这段治学轶事，如今回想，仍令人感奋不已，思绪万千。

（武汉市文史馆供稿）

蔡沧白，四川辛亥革命元老，重庆曾有沧白路，建有沧白堂，都是纪念他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孙中山最后一次参加“双十节”

谢平难

从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之日起，一直谋求统一中国，计划北伐，以后经过陈炯明叛变，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内部掣肘，迟迟不能顺利实现。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改组成功，革命形势高涨。孙中山曾派人与北方张作霖、段祺瑞联系，共同对付正在弄权“贿选”总统的曹锟，阻遏北伐控制两湖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同年9月，江苏、浙江之间直奉军阀战争爆发，孙中山预见到直奉大战为期不远，决定乘机北伐，以大元帅身份亲自率领北伐军到达韶关。当时结集的部队计有湘军总令司谭延闿统率的湘军为主力，所辖五个军中，有第一军军长宋鹤庚、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第三军军长谢国光、第四军军长吴剑学、第五军军长陈嘉祐。其中以第三军较有实力；此外，尚有滇、桂、赣军以及程潜等人的部队。

那年10月10日，在韶关的革命军民，举行辛亥武昌首义十三周年纪念庆祝典礼，孙中山亲自参加，以朱培德为指挥官，举行了阅兵式，随同参加的有大本营秘书长谭延闿，湘军第五军军长陈嘉祐及各军政高级人员等。参加阅兵的部队，除上述各军派有一部外，还有苏联水兵一小队。孙中山讲了话，主要回忆辛亥武昌首义时的情况，并与当时北伐形势作了对比，预言北伐一定胜利。大意为：十三年前武汉革命党人在清廷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秘密活动，人数不多，计划起义时间一度被迫推迟，后来决定起义，时间未到，指挥机关被清廷破获，搜去名册，清廷军警大肆逮捕革命

党人，在此不能坐待杀头的关头，又得不到指挥机关的命令情况下，工程营冒险发难，新军各营起而响应，一举攻占了湖广总督署，建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第一功。现在北伐军军势甚壮，万心归一，远非辛亥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势单力薄且处于地下秘密活动可比。而军阀反革命势力偏处北方，因其惯于穷兵黩武，残民以逞，民众离心。正义在革命一边，民众在革命一边，北伐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孙大元帅的讲话，给与会军民以莫大的鼓舞，全场欢声雷动，口号震天。

就在同一天，当广州群众为庆祝“双十节”举行大游行时，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商团，开枪屠杀游行群众，企图颠覆革命政权，孙大元帅立即下令结集在韶关的北伐军回师广州，迅速镇压了叛乱。但使北伐计划又受到一次波折。

此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山海关滦西一线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原属直系的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吴佩孚率到天津浮海南逃。北方政局由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联合控制，中山先生应冯玉祥商讨解决时局问题的邀请，抱着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于11月13日带病离广州北上。会谈中由于段祺瑞等坚持崇洋、分赃的反动立场，中山先生忧愤至极，一病不起，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谁能想到，驻节韶关大本营时还不到六十岁的中山先生，参加“双十节”纪念会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

（武汉市参事室供稿）

作者早年留法勤工俭学，现任武汉市参事室参事

詹大悲论辛亥武昌首义

杨玉清

詹大悲在大革命时代，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还兼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不幸于1927年12月17日被反动军阀胡宗铎、陶钧杀害于汉口，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教育厅长李汉俊。

詹大悲是辛亥革命首义的参加者，曾多次主持过革命文坛的笔政。在辛亥革命前曾创办过《大江报》，联络同志，鼓吹革命。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还代表武汉的同志到上海和宋教仁等联系，力谋大举。辛亥革命后，在武昌设湖北军政府，在汉口设军政分府。汉口军政分府即由詹主持。

1927年的“双十节”，正是武汉国民党叛变革命不多时，也是詹被杀害前的不多时，在武昌阅马厂红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大礼堂召集了一个纪念会，那时正进行所谓“分共”，空气非常紧张，环境非常恶劣。大家都说，国民党的革命性被抽掉了。信心强的是少数，他们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信心弱的是多数，他们悲观失望地说：如此下去，革命又不知要顿挫多少年。詹恰于此时，在这个纪念会上，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演，真可以镇定人心、振奋人心，其中有两点主要谈辛亥革命的事，我现在叙述如下：

一、他说：“今天我们来纪念‘双十节’，不禁想起了已死的革命先烈们。革命之花，是先烈之血灌溉起来的，先烈之血当然不能白流的，先烈们都是有伟大的抱负，为革命的理想而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的！怎奈，天下不如意事常十居八九，辛亥革命以后

的情况很不好，不但距离革命的理想很远，甚至与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驰。革命的人，已死的弄得尸骨没有人掩埋；活着的也不免穷愁潦倒。倒是那些残杀革命党的人，却大享其革命之福，大做其革命之官！”当时反动力量已逐渐抬头，革命的人都被赶开了，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却成了时髦人物，其气焰十分嚣张，历史出现了迂回。詹大悲的这一段话，是对当时的情况有所感而发的。

二、他说：“辛亥革命，是有计划干的。辛亥首义以前，在武汉的革命志士们，不知经过了多少次酝酿，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磨难，才完成了各种组织和部署。头一天晚上总机关被破获，彭、刘、杨三烈士壮烈牺牲，第二天革命志士仍然照原定计划执行，并不因为自己人有了牺牲而气馁。那天晚上八时的起义，是由很多同志遍历各处联系好了的，所以工程营发了第一枪后，楚望台的炮就打响了，以后各营部队都起来了，全部新军都有革命同志作骨干。枪炮之声，彻夜不息。这说明革命力量雄厚，声势浩大，不是少数人偶然之间所可形成的。首义最初的半个月是最困难时期，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这时距离中华民国改元还有两个多月，能支持这半个月，才有以后湖南的援军；能支持一个月，才有以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江西的光复；能支持一个半月，才有长江下游一带的响应。这一切的一切，不能不归功于武昌首义。然而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是怎么样呢？他们把辛亥武昌首义成功，说成是‘意外’，说什么‘按武昌的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于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他们还说：‘冒险图功，初不意一击而中’。我们说：不错，起义那天晚上瑞澂、张彪逃到楚豫军舰上去了，但他们的逃，是知道大势已去才逃的，他们绝不是神经病，知道自己有办法而偏把江山让给别人”。

詹大悲接着还说：“我曾经将这段历史向孙中山先生申述过。

孙先生答复说：那是些个人的意见，将来修纂正史时可以改正过来。

对于这一点，1936年戴季陶到法国巴黎时，笔者曾和戴谈过。他却对我声色俱厉地说："这个人的失败，就是告白太多。"戴竟把詹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说成是"告白"，说成是"自我宣传"。

抗战初期，陈果夫在重庆中山学社讲国民党党史时曾说过，国民党当中的力量，有三大主流，一是两广，二是两湖，三是江浙。黄花岗起义，代表了两广的力量；辛亥首义，代表了两湖的力量；国民革命军北伐，代表了江浙的力量。他的意思是说前两者都是失败的，只有后者才是成功。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对辛亥革命的估计，确不免有些宗派主义的成见。戴季陶、陈果夫的看法，不过是其中的两例。保存信史，人人有责。我现在将这个材料记录下来，一以志对先烈景仰之诚，一以供关心此问题者参考！

（1983年6月）

作者现任国务院参事。

记湖北军政府的成立

李白贞

一、找黎元洪做鄂军都督　二、在咨议局开会建立军政府　三、严密布置防务　四、十八星红旗长空飘扬

一、找黎元洪做鄂军都督

革命党人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胜利，二十日肃清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革命总算有了初步成功，但是瑞澂还在楚豫兵舰待援。不日，当有大军来反攻，必须早事准备，尤其是民政方面事情更为繁重，最紧要的正是安民布告，现在统帅人选还没有产生，布告上的署名就成了严重问题。吴兆麟提议找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来担任鄂军都督，当时有些人反对。不过这时如吴禄贞、蓝天蔚等本是众望所归；其次，如黄兴、居正、孙武、刘公亦可符合群情，但他们此时都不在这里，有的还受了重伤，也有的早已声明不干。好在革命目标是在驱逐满人，只要是汉人就没有多大问题。因此，一致同意先把黎找来，然后邀集城内绅耆父老会商通过。

这时，马荣、程正瀛从提到黎元洪的护兵口中得知他躲在黄土坡协部参谋刘文吉家里，马荣、程正瀛就与汤启发、徐寿林等带兵一排，由这个护兵作向导，到黄土坡先将刘宅前后包围，再进入刘家把黎元洪从密室中搜了出来，他已吓得惊惧万状，几乎话都说不清楚，期期艾艾地对大众说："黎某治军素宽，你们何得谋

我？”众人说：“我们并不是要谋统领，是来请统领出来主持大计的。”黎说：“革命党人才济济，要我何用？”众说：“统领非去不可。”黎说：“要我到哪里去？”众说“到楚望台和吴兆麟总指挥见面。”黎说：“吴兆麟很好，有他一人就可能当大事，无须要我了。”众人都有些不耐烦，有人说：“我们好意来请你，如你坚执不去，是自取其祸。”黎又踌躇有顷，才说：“我去，我去。”汤启发就令人先回楚望台报信，徐寿林即为他备马，簇拥着往楚望台走来，他的执事王安澜也跟着同行。

吴兆麟听到黎元洪到了，令部队鸣号敬礼，举枪欢迎。黎下马对欢迎的人说：“诸位辛苦了。”时有一炮兵高呼请统领下令作战，王安澜在旁嘱黎莫理他，炮兵大怒，举刀欲砍，黎即以身相蔽，说：“他是我的执事官”。吴急呵止炮兵“不要乱动。”

黎对大众说：“武昌城虽然占领，瑞澂、张彪在逃，一旦大军到来，水陆进攻，你们外无援军，内无粮饷，毫无准备。我曾学过海军，如海圻等兵舰，武昌只须三炮就可以全毁。你们不知厉害，我劝各位还是各自回营休息，再行商议，倘是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众人听了，都不大以为然，怒形于面。邓玉麟说：“统领不知道，我们革命党早就有充分准备，湖南焦达峰数日内就起兵来响应，京山刘英现在襄河一带，日内也要举事。我们并不孤立无援。”熊秉坤也说：“藩库、官钱局、造币厂，存款很多，粮饷不必顾虑。”何竹山走到黎面前厉声说：“实告统领，革命事业，本来没有万全之策，我们生死成败，在所不计，援军饷粮，果然重要。但是，不能期其必备，要看我们措施如何，我们这时是天与人归，也是你千载一时的机会，劝你不必犹豫吧！”李翊东说：“此地不是商议之所，请到咨议局去会商吧！”此时还有人提议强使黎统领到保安街一带察看防务。一时意见很多，莫衷一是，只好暂搁置不议。

二、在咨议局开会建立军政府

武昌咨议局是清政府假借宪政会议和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民意机关，位于武昌城中心地区阅马厂，就是清朝演武厅的旧址，背靠蛇山的地点，用红砖瓦建起了一座西式高大楼房，成立了这个咨议局。

当时黎元洪乘着马，离开楚望台到咨议局，路过右旗第十五协营门前，管带何锡蕃迎黎进协本部休息，用茶点款待，并列队操场守卫，态度十分殷勤。熊秉坤怕有变故，暗牵邓玉麟衣角，促黎赶早动身离开，于是大众又拥黎就道，继续往咨议局前进。到达门口时，有人高呼“黎都督到了”。黎听了，只默然不发一言，也无任何表示。

这时咨议局里已有多数宪政派分子，如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议员夏寿康、阮毓松、游维周、刘赓藻、胡瑞麟和秘书长石山佺等，都已应邀先后到局等候。午后，吴兆麟等簇拥黎元洪入内和大家见面。随后，黎元洪和李翊东、李春萱、蔡济民、徐达明、王文锦、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周定康、陈鸿浩、陈磊、邢伯谦、赵学魁、苏成章、毕申、高振霄、方定国、李国镛及前议长议员们步入会议厅开会，筹议善后大计，公推汤化龙首先发言。

汤化龙说：“革命事业，兄弟素表赞成。但是，此时发难，各省都晓得，须从速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伟举，鄙见瑞澂逃在楚豫兵舰，必定有电报到北京，清廷闻报，当有大军南来和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不是军人，不知用兵，关于一切军事措施，还请诸位慎重筹划。”

吴兆麟接着说：“汤济武先生所说，确是定论，现在武昌既经首义，瑞澂决不甘心，定图报复，这是必然之势，这次武昌首义，军政商学各界均表同情，即以军事来说，湖北兵虽算不得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